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

陈宇, 赖小琼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以1952-2011年作为研究的时间序列, 就福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分析, 研究表明: (1) 从“量”上来看, 产业结构变迁对福建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与壮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然而, 分组回归结果同时反映出这样的事实, 即福建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作用要大于第二产业。基于此, 在接下来的经济工作中, 应高度重视省内“三农”建设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2) 从“质”上来看, 产业结构变迁是影响福建省内劳动生产率的主导因素。但由于产业结构存在要素资源“反配置”和“同质化”等问题, 以过度投资为突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浪潮可能对福建经济未来的稳健发展形成严重威胁。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在第五部分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变迁; 福建省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2013)01-0020-08

一、前言

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较, 福建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表现可谓大相径庭。1978-2011年, 福建省GDP年均增长率达12.8%, 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11.3%; 经济总量全国排名由1978年的第22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12位(如表1)。建设成效极为显著, 发展十分迅速。那么, 是什么因素推动着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这样的高速增长中, 区域内劳动生产率是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丹尼森(Denison, 1967^①)、麦迪逊(Maddison, 1987^②)、钱纳里(Chenery, 1989^③)主张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习近平(2001^④)认为, “产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 产业结构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的生产水平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干春晖等(2011^⑤)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则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本文以1952-2011年作为研究的时间序列, 就产业结构变迁与福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的分析, 针对福建省目前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收稿日期: 2012-08-25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研究报告》阶段性成果, 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 2011231042)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项目编号: 11JBG006)资助。

作者简介: 陈宇(1987—), 男, 福建南安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与制度变迁。
赖小琼(1958—), 女, 福建长汀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① Denison, E. F., Poulter, J. P., 1967, “Why growth rates differ: Postwar 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② Maddison, A., 1987,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5 (June), pp. 649-698.

③ [美]H·钱纳里、S·罗宾逊、M·赛尔奎因 《工业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吴奇、王松宝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④ 习近平 《福建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 《管理世界》2001年第5期。

⑤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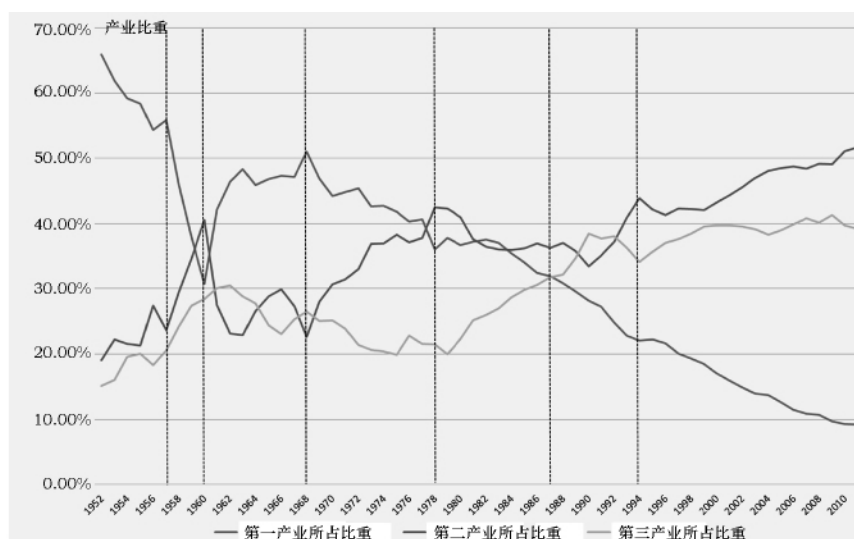
表1 闽、浙、粤、沪、苏、鲁六省市 GDP 全国排名变动趋势

单位: 亿元

年份	福建省		浙江省		广东省		上海市		江苏省		山东省	
	GDP	排名	GDP	排名	GDP	排名	GDP	排名	GDP	排名	GDP	排名
1952	12.7	22	24.5	11	2.95	8	36.7	5	48.4	1	43.8	2
1960	29.6	22	47.3	15	72.7	6	158.3	1	86.8	2	71.4	7
1970	34.7	23	69.2	13	112	5	156.7	1	129.2	3	126.3	3
1978	66.4	22	123.7	12	185.8	5	272.8	1	249.2	2	225.4	4
1980	87.1	22	179.9	12	249.7	5	311.9	2	319.8	1	292.1	3
1990	522.3	14	904.7	6	1559	1	781.7	10	1416.5	3	1511.2	2
2000	3764.5	10	6141	4	10741	1	4771.2	7	8553.7	2	8337.5	3
2010	14737	12	27722	4	46013	1	17166	9	41425	2	39170	3
2011	17560	12	32319	4	53210	1	19196	11	49110	2	45362	3

相关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国经济数据库 (CEIC) 整理计算而得。

二、产业结构变迁对福建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据来源 《福建省统计年鉴 2011 年》

图1 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1952 - 2011 年)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内容^①。图1描述了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可知1952年,福建省三产比重为65.9:19.0:15.1,农业在彼时福建经济盘子中占据着主导地位。1978年,福建省三产比重调整为36.1:42.4:21.5,第二产业替代第一产业成为福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11年,福建省三产占比变更为9.2:51.7:39.1,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不断上升。如果将福建省60年经济发展数据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段,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即1953-1978年,福建省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5.64%;第二产业48.82%;第三产业仅5.54%;改革开放后,即1979-2011年,福建省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1.24%,第二产业为55.3%,第三产业33.46%。由此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着较大降幅,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着较大提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对福建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扮演着此消彼长的角色。相比较而言,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稳定,稳中有升。

进一步地,为衡量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笔者引入虚拟变量 *Reform* 来描述改革开放进程。令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GDP_{\text{福}}$, 三次产业产值分别为 FI 、 SI 和 TI , 工业产值为 $Indus$, 将福建省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及制度变量分组回归, 可得如下结果 (见表2):

^① 魏杰 《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调整》, 《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表2 福建省经济增长与三次产业及制度变量分组回归的结果

产业类别	回归方程
第一产业	$GDP_{福} = -266.34 + 26.34FI - 421.52 Reform$ (-5.41) (17.87) (-4.62)
第二产业	$GDP_{福} = 20.05 + 0.86SI + 91.92 Reform$ (2.48) (110.79) (7.35)
工业	$GDP_{福} = 22.03 + 0.83 Indus + 99.07 Reform$ (2.75) (112.16) (8.04)
第三产业	$GDP_{福} = 3.50 TI - 14.73 Reform$ (216.10) (-2.77)

表中“()”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 t 统计量

可知,产业发展对福建经济的增长起到积极的拉动作用(三次产业的回归系数为正)。特别地,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对福建经济增长的边际带动作用最为明显(系数值为26.34),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福建发展“三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作用要大于第二产业,表明在福建省,以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产业其边际报酬率并不高。换句话说,福建省内虽建成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其自生能力并不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量,而不是通过质来推动。应当看到的是,较之改革开放以前,福建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均有弱化的趋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系数值为负)。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支撑(系数值为正)。显然,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官员可能出于显性政绩的考虑而强力推进第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各地市着力建设光伏、LED产业以及“铁公鸡”等基础设施就是这样的例子。分析表明,如果经济资源能够从第二产业分流一部分到高附加值的第一产业(如茶叶、园林水果、食用菌、水产品和林业等)和第三产业(如物流、仓储、金融、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则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得到有效的改善与提升。

三、产业结构变迁对福建省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在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量”的关系后,接下来就得对经济增长“质”的问题进行一番分析。劳动生产率作为反映增长质量的理想指标,它描述了区域劳动的投入—产出效果,其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薪阶层的劳动报酬,对消费、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另外,劳动生产率反映了特定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区域未来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这里,笔者采用“转换份额分析方法”(Shift-Share Analysis)就1952—2011年不变价格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进行测度。转换份额分析法最早由法布里坎(Fabricant, 1942^①)提出,它将劳动生产率分解为结构变化的贡献与产业内部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其在转型经济结构变迁中的运用主要见于法格博格(Fagerberg, 2000^②),帕内达(Peneder, 2003^③),刘伟等(2008^④),干春晖等(2009^⑤)。

令 LP_i^t 代表第 t 期劳动生产率, GDP_i^t 代表第 t 期地区生产总值, L_i^t 代表第 t 期劳动就业人数。 GDP_i^t 表示第 t 期第 i 产业的产值, L_i^t 表示第 t 期第 i 产业的就业人数。 ω_i^t 表示第 t 期第 i 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有:

$$LP_i = GDP_i / L_i = \sum_{i=1}^n \frac{GDP_i^t \cdot L_i^t}{L_i^t \cdot L^t} = \sum_{i=1}^n LP_i^t \cdot \omega_i^t \quad (1)$$

设 $g(\cdot)$ 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则 t 时期相对 k 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表示为:

① Fabricant, S., 1942,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1899—1939", NBER, New York.
 ② Fagerberg, J., 2000,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 11, pp. 393—411.
 ③ Peneder, M., 2003,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 14, pp. 427—448.
 ④ 刘伟、张辉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
 ⑤ 干春晖、郑若谷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中国1978—2007年“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2期。

$$\begin{aligned}
 g(LP) &= \frac{LP^t - LP^k}{LP^k} = \frac{\sum_{i=1}^n LP_i^t \cdot \omega_i^t - \sum_{i=1}^n LP_i^k \cdot \omega_i^k}{LP^k} \\
 &= \frac{\sum_{i=1}^n (\omega_i^t - \omega_i^k) LP_i^k + \sum_{i=1}^n (LP_i^t - LP_i^k) \cdot (\omega_i^t - \omega_i^k) + \sum_{i=1}^n (LP_i^t - LP_i^k) \cdot \omega_i^k}{LP^k} \\
 &= E_s + E_d + E_p
 \end{aligned} \tag{2}$$

由式(3-2)知,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分解为以下三部分:

- (1) 静态结构变迁效应 E_s ,它反映了劳动力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时所引起的总体劳动生产率 LP 的净提升,即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生产率的变化。
- (2) 动态结构变迁效应 E_d ,它衡量的是行业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要素占比权重变动的相互影响对总体劳动生产率 LP 的作用效果。
- (3) 生产率增长效应 E_p ,它度量了产业结构不变时,劳动生产率受各产业劳动生产率 LP_i 变动的影

响。得到的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矩阵,如表3所示:

表3 福建省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矩阵

1952-2011年				
结构效应类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地区生产总值
静态结构变迁效应	-0.4474 (-0.66%)	1.1813 (1.75%)	0.2719 (0.40%)	1.0058 (1.49%)
动态结构变迁效应	-2.9842 (-4.41%)	45.6088 (67.46%)	7.8742 (11.65%)	50.4988 (74.69%)
生产率增长效应	4.3964 (6.50%)	7.3395 (10.86%)	4.3683 (6.46%)	16.104 (23.82%)
总计	0.9648 (1.43%)	54.1296 (80.06%)	12.5144 (18.51%)	67.6088 (100%)
改革开放之前(1952-1978年)				
结构效应类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地区生产总值
静态结构变迁效应	-0.0550 (-4.07%)	0.2980 (22.04%)	-0.0161 (-1.19%)	0.2269 (16.78%)
动态结构变迁效应	-0.0030 (-0.22%)	0.4199 (31.06%)	-0.0485 (-3.59%)	0.3684 (27.25%)
生产率增长效应	0.0354 (2.62%)	0.2678 (19.81%)	0.4534 (33.54%)	0.7566 (55.97%)
总计	-0.0225 (-1.67%)	0.9857 (72.91%)	0.3888 (28.76%)	1.3519 (100%)
改革开放之后(1979-2011年)				
结构效应类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地区生产总值
静态结构变迁效应	-0.1763 (-0.63%)	0.8790 (3.14%)	0.4474 (1.60%)	1.1501 (4.11%)
动态结构变迁效应	-1.0686 (-3.82%)	13.4714 (48.09%)	3.1513 (11.25%)	15.5540 (55.53%)
生产率增长效应	1.6584 (5.92%)	8.1060 (28.94%)	1.5418 (5.50%)	11.3061 (40.36%)
总计	0.4134 (1.48%)	22.4564 (80.17%)	5.1404 (18.35%)	28.0102 (100%)

1. 相关数据由笔者根据《福建省统计年鉴(2012)》、《新中国统计资料六十年汇编》整理计算而得。

2. 表中“()”内数值为相关产业相关效应的贡献度。

可知1952-2011年,福建省产业结构变迁(包括静态结构变迁效应与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达76.18%。特别地,动态结构变迁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分别达84.26%和62.92%。也就是说,福建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源于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所带来的丰厚的“结构红利”;而且,通过进入更高效率的生产部门,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积累经验、模仿技术等“干中学”方式不断创造出更高的价值——作为内生动力,这极大地提高了区域资源的配置效率。进一步地,以1978年为分界点,在此以前,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为44.03%,表明这时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内部生产率的增进。此后,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提高到59.64%,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转而依靠部门间要素资源的流动与优化来实现。就第一产业而言,由于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迁移出来,劳动投入占比不断下降,故改革前后结构变迁效应均为负值。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温和的增长主要源于第一产业制度变革与技术进步有力地推动了内部生产率的提高,且改革开放后内部生产率的提高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前。与总体劳动生产率相类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依赖内部生产率增长到改革开放后依靠产业结构变迁的转变。而在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变迁则始终作为促进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四、福建省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 要素资源存在“反效率”配置

产业结构变迁至今,要素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到位?对此,笔者采用结构偏差系数对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偏离度进行测算。数学表达式为:

$$E_i = S_i/L_i - 1 \quad (3)$$

其中, S_i 表示第*i*产业的产值比重。 L_i 表示第*i*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当 $E = 0$ 则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处于均衡状态。 $|E|$ 值越大,则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差越大,资源配置仍存在调整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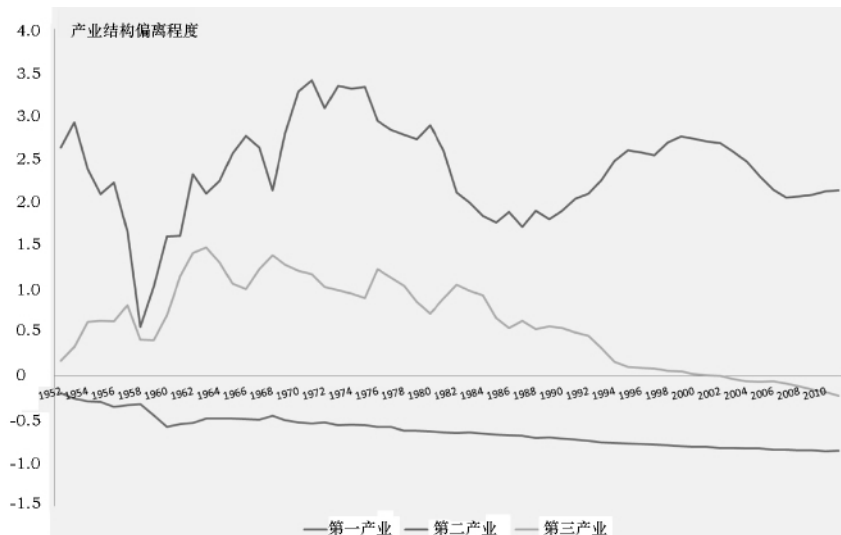


图2 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系数(1952-2011年)

如图2所示,福建省第一产业的结构偏差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趋于上升,表明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现象并没有随着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有所缓解,相反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原因有三个:一是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得土地耕种对于劳动力需求日益相对地甚至是绝对地减少;二是部分农村劳动力由于年龄偏大,体力、反应灵敏度或操作精确度逐年下降,这使得他们在既定的生存工资约束下难以同年轻农民工相竞争,在城市就业的难度比较大;三是部分农民(主要为女性)需要承担起种植承包土地、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等家庭职能。相比较而言,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正,且绝对值较之第一产业偏离度来得更大,表明该产业存有资本过度配置的现象。产业资本的过度积累常常是

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缘故,以期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产值,提升政绩指标^①。然而,这样的要素资源“反配置”不仅容易造成工业部门资本收益率出现非正常下降,拉低居民消费率,造成社会就业不充分;而且,片面地追求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大而全”往往会使得产业缺乏必要的自生能力,需要政府予以扶持和补贴。这对培育和发展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并无太多益处。近年来,以过度投资为突出特征的“重工业化”浪潮对福建经济的稳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当引起警惕。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先是为正,而后趋零,自2003年以后出现负值,表明其内部结构正由资源“反配置”逐步回归理性状态,成为吸收过剩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因此,要解决产业结构中要素资源的“反配置”问题,就应当鼓励第三产业加速发展;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条件,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纠正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要素投入的扭曲。

(二) 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度不断上升

关于产业结构同质化,笔者采用相似系数就福建省九地市2002-2011年三产结构趋同程度进行测算。数学表达式为:

$$S_{ij} = \frac{\sum (x_{ik} \cdot x_{jk})}{\sqrt{(\sum x_{ik}^2)} \cdot \sqrt{(\sum x_{jk}^2)}}, \quad (4)$$

其中 x_{ik} 是城市第 k 产业的产值比重 x_{jk} 是城市第 k 产业的产值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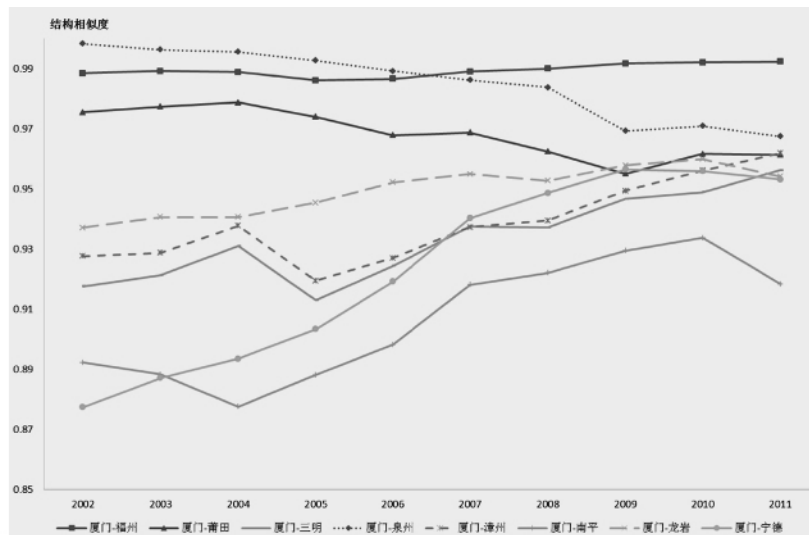


图3 福建省九地市的产业结构趋同度(2002-2011年)

如图3所示,以厦门为参照物,2011年,九地市产业趋同度达0.9以上,表明福建省内产业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近年来,除莆田、泉州两市产业结构趋同度稍有下降以外,其他地市的产业结构趋同度均较2002年相比有所上升,可见区域内部产业结构在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上仍存有较大的挖潜空间。究其制度本源,首先在于政绩考核的单维度——地方经济增速成为评判官员能否得到晋升的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随着行政性分权及财政上“分灶吃饭”改革的逐步推进,地方政府具有短期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及大量投资的强烈冲动,反映在产业发展上,即高度重视地方工业基础的敦实和地方工业体系的完善。其次,区域城市间的竞争还夹带有政治晋升博弈^②。地市政府“一把手”除了需要顾及产业投资与经济增长外,往往还要考虑上级政府对不同地域经济绩效相对位次的评价情况。一般地,只有当自身的经济收益大于对方,区域协同合作及产业分工细化的决策才会付诸实施。进一步地,为保护本地利益,防止税源外流,增加可支配资源,地方政府可能采取行政指令或财政政策等宏

^① 魏凤春 《中国改革周期中的公共政策变化(1949-2002年)——一个财政视角的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②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观调控手段对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进行强制性干预。地方保护主义及相伴相生的交易成本的上升都将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走向趋同^①。至于莆田、泉州同厦门产业结构趋同度下降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上述两地加速发展重化工业所致。如莆田在2008年提出“以港兴市、工业强市”发展战略;泉州在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快建设海西现代化工贸港口城市”,石油炼化一体化已然成为两地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与厦门极力打造外向型经济与服务型经济的目标存在差异。总之,虽然福建省内各地市的产业结构同质化仍有不断增强的趋势,但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战略性产业考虑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间分工,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差异化。

五、政策建议

基于福建省目前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把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作为未来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支撑点,着力推动福建产业结构向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低碳化等方向转变。建议如下:

(一) 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

鼓励制鞋制革、服装纺织、建材陶瓷、食品饮料、半导体照明等消费品制造业向“塑造品牌、提高档次、保质保量”方向转变;推动电子机械、移动通信、汽车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向创新型产业集群转变。发挥政策引导,鼓励产业内部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建设研发中心,加快产品、技术的升级换代,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进一步完善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的环境设施和功能配套,着力打造特色专业园区,完善产业链条,为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提供平台支撑。支持上市公司开展再融资和资本运作,引导优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聚,为上市公司做大规模做强实力创造良好的公共环境。积极培育省内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数量优势,持续加强品牌创建、品牌运营和品牌提升;培养一批企业巨星和优秀中小企业,全力打造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品牌企业。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公共创新平台,促进传统产业链整体创新。

(二) 推动新兴产业做大做强

根据国家和福建省“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挥现有工业园区的产业集聚辐射和带动效应,重点推进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的“组团式”发展。壮大一批高成长性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实施战略主攻计划,集中力量引进和培育一批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企业大集团。新兴产业的核心是新技术,只有科技创新的成果产业化才能催生和发展新兴产业,因此,要加强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推进新兴产业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加快推进“三创”园区的基地建设。另外,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培育一批有实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打造一批知名文化产品、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

(三) 推进现代服务业提速发展

服务业是目前福建经济发展的短板,要强化政策举措、从规划、政策、项目、体制入手,优先发展以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商务会展、旅游服务、科技信息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打造若干个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鼓励和引导制造业企业分离研发、物流、采购、营销及其它专业配套服务环节,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加快推进区域物联网建设,努力提高商品流通的信息化、标准化、组织化、国际化,打造区域性大宗货物资源配置中心和集散中心。积极发展电子商务、总部经济、楼宇经济、会展经济和服务外包,建设现代服务业集中区。大力引进和发展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基金公司、创投公司、担保公司等多种金融业态,构建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加快培育以第三方物流为主体,以第四方物流市场为平台的现代物流体系,塑造海西重要物流节点城市。引进广交会、世博会等先进理念,扩大鞋业制革、纺织服装、建材陶瓷等传统产品专业会展的辐射范围,打造国际贸易展览中心。大力整合、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做足“海”、“山”文章,保护好岸线资源和山区生态资源,生成一批休闲旅游度假项目,建设海西一流旅游目的地。

^① 胡向婷、张璐 《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四) 推进循环经济体系建立与完善

加快推进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环境保护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倒逼作用, 把环境容量作为经济建设的依据, 把环境准入作为经济调节的手段, 把环境管理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措施, 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循环经济发展。对省内现有工业园进行集约化、集聚化和专业化改造提升; 实施一批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 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和企业共生发展的产业群; 支持一批节能环保技术应用示范工程, 推广使用节约资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 积极发展节能、节水、低耗、环保型设备, 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引导企业清洁生产, 对诸如建材、造纸、炼焦、化工、印染、制革、钢铁、水泥等高能耗行业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深入推进再生资源回收工作, 加快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坚持“宁可少一点, 也要好一点”的要求, 严把项目产业政策关、资源消耗关、环境保护关, 确保新上项目达到环境保护标准, 符合科学发展要求。树立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的开发理念, 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定位, 切实做到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相统一。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完善城乡间、区域间的生态协同保护机制, 调动利益相关地域和条块分属单位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统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的新、改、扩建工程, 完善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在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 更加注重农村环境改善, 推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环境监管向农村覆盖、环保投入向农村倾斜, 加强城乡环境保护的联动与协作。

(特约编辑: 李碧珍)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ment On Fujian's Economic Growth

CHEN Yu, LAI Xiao-qiong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would like to engage in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jian's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ment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52 and 2011.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have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ly, the reason why Fujian enjoys an economic succes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at its secondary industry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rapid development until now. However, group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mary and the third industry in Fujian are now playing a stronger marginal role.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a higher attention to the perfect of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ervice sector. Secondly,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s also the dominant factor lifting Fujian's labor productivity. Unfortunately, problems such as "reverse configuration" of resources and homogenization of industries between cities are now giving rise to the zeal of excessive investment and heavy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might eventually prove to be a serious threat to Fuji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future. In the end, we give som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Fujian